

第四届中国科技政策论坛在京召开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垠)6月13日,第四届中国科技政策论坛在北京召开。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常委会决策咨询专门委员会主任齐让,中国科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以及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担任本届论坛主席。

论坛包括大会主旨报告与专题对话两个部分。大会报告由方新主持,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出席论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王一鸣,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中国科技发展策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分别做了题为《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思考》《以深化改革打造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财政科技政策与财政科技改革》《新时期的科技体制改革》的主旨演讲。

专题对话聚焦于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转化两大议题。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任福君主持科技人才专题对话,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高昌林,中国科协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罗晖、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晓轩、中国人事科学院人才队伍

建设研究室副主任孙锐担任对话嘉宾,围绕科技人才储备、人才评价、人才激励以及人才计划等热点问题展开互动,并与参会人员进行了充分交流。

科技成果转化专题对话由中国科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穆荣平主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昌林、中国科技发展策略研究院党委书记林新、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副部长郭哲、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副主任梅萌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创新与战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柳荫担任对话嘉宾,针对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内涵、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技术定价难题、新政策实施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等焦点问题各抒己见,并开展深入研讨。

作为面向决策和社会公众的开放性高端学术交流平台,中国科技政策论坛由中国科协常委会决策咨询专门委员会主办,中国科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承办,得到了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和中国科协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论坛宗旨在于加强科技政策制定者、专业政策研究人员、科学家和社会公众之间的思想交流和观点碰撞,为繁荣科技政策学术研究和促进科技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建言献策。

论坛每年举办一届,自2012年以来已连续举办四届,形成了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和品牌效应。



建言科技人才发展 问道科技成果转化

□本报记者 刘垠

如果说第四届中国科技政策论坛的主旨报告着眼于宏观体制机制,专家们围绕创新驱动和深化改革建言献策。那么,下午的专题对话则更关注当前科技界的焦点话题,科技人才发展和科技成果转化问题。

如何建立一个既适应科研活动规律又能激发科研人员创造力的收入分配制度?又怎样营造一个人尽其才且才尽其用的良好氛围?

根据工作过程中的相关调研经验,科学技术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高昌林认为,要优化科研人员的收入结构、规范分配秩序,健全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建立利于科研人员职业发展和有效激励科研人员积极性的薪酬体系。

“这些年我国科技界内外实施的人事制度改革不可谓不多,但这些改革大多涉及科技人才的‘增量’部分,对于更为深层次的‘存量’部分则远未触及。”以科技人才流动为例,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李晓轩研究员直言,行政和制度上的约束不再是人才流动的主要障碍,但人才流动的市场机制仍难以作用于大量水平有限、位于科学分层金字塔底端的科研人员。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始终把“人”摆在最突出、最优先的位置,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孙锐建议,一要确立人才工作在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中“重中之重”的地位;二要推动人才评价机制改革,发挥人才评价指挥棒的作用;三是完善创新成果收益分配政策,提高事业单位科技成果转化或转让所得收益用于奖励成果完成人或转化人员的比例,科技奖励不纳入单位工资总额基数;四是进一步完善政府人才管理制度。

科技成果转化难,症结到底在哪里?毫无疑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中心环节,这也是我国科技创新的薄弱环节。

“我们急需实现三个转变,切实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昌林研究员说,一是要以改革科研项目管理制度为突破口,推动技术创新向市场需求导向型为主转变。二是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完善专利交易制度为抓手,推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方式向技术转移、许可为主转变。三是以完善相关经济政策和金融服务为重点,促使科技成果转化向以经济手段和市场化融资为主转变。

国家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从科研机构减拨事业费、培育技术市场、技术开发院所转制,到股权激励、产学研合作、科技与金融结合等,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内容不断丰富。

“科技成果转化需要科技界、经济界的共同努力。”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书记林新看来,随着科研机构分类改革逐步深入,企业日益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科技成果转化的条件和环境发生很大变化,要根据转化中不同主体和不同环节的不同需求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准确把握不同主体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功能定位,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和支持科技成果转化。此外,还需加强对科技成果转化转化的公共服务和政策支持。

科技成果的转化与科研经费的来源密切相关,比如企业支持科研,好奇心驱动科研以及国家计划支持类的科研,三者的成果转化模式与转化率有着重要区别。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柳荫表示,企业支持的高校科技,目标明确更有利于商业化。好奇心驱动的科研是传统的科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的支持下,研究的产品主要是论文、专利,有商业化价值的成果则是副产品。

“国家需求驱动的成果是科技成果转化问题。这些科研立项,是要解决国家发展中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柳荫说,诸如国家科技计划的使命性的科技,更需从市场出发,需要有效的产业化链条,不能让这类科研成为一个孤立的行为。

清华大学教授、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主任梅萌认为,科技成果转化应是一种产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产业模式包括作价、经营和分配。由技术、专家和市场营销专家组成的专业机构进行作价,经过商业谈判后形成最终市场价格。

“经营科技成果最重要的两个要素,要有钱(专项资金),有人(经营过小公司的人)”梅萌直言,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分配,可借鉴运行了45年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的规则,即扣除15%的收益给专业成果转化机构,以作该机构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保证。

对话科技政策热点 力促科学决策民主化

□本报记者 刘垠

在第四届中国科技政策论坛上,围绕“深化体制改革、创新驱动发展”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就科技体制改革、创新驱动发展、科技人才评价和激励、科技成

果转化等热点话题直抒己见。此外,专家就科技政策热点、科学决策民主化等相关议题进行现场互动和深入探讨。

刘世锦:新常态下的创新之路怎么走



中国经济到了一个需要创新驱动的时候了。新常态下的创新之路该怎么走,在题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创新驱动》的报告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向与会者娓娓道来。

“新常态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经济增长的速度由过去10%的高速增长转向一个中高速增长。”刘世锦说,过去的高增长是由高投资引起的,高投资主要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三项构成。近几年,基础设施在整个投资中增长的比重为20%到25%,房地产约是25%,制造业投资则超过30%。

“中国的高增长触底,实际就是高投资要触底。”刘世锦认为,严重过剩的产能的退出和重组,必须要取得实质性进展。特别从2002年开始,经济高速增长

长主要靠房地产、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要消费品的高速增长来带动,这也带动了一大批如钢铁、铁矿石、石油等重化工业的快速增长。

这表明,我们需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包括服务业的扩张、生产力的提升,特别是加快创新的步伐,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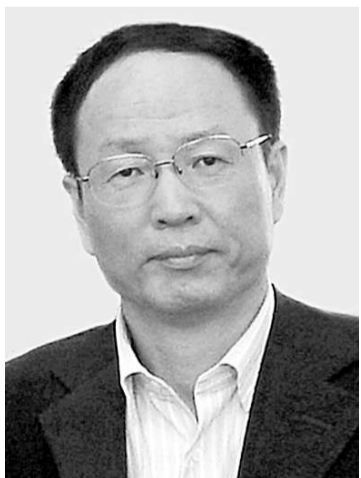
那么,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底”在何方?刘世锦以数据为例说,今年一季度国内GDP增长速度为7%,但从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现状来看,GDP增速可能会稳定在6%到6.5%。

“下一步要保持持续的增长速度,即使要以6.5%的增长速度往前增长,一定要有新的增长动力,这就需要创新。”谈及创新,刘世锦话锋一转,“创新是一个要素、流动和聚集的过程,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各个行业中,涌现一些创新型的龙头企业。”

不少人会问,新的经济增长点究竟在哪里?在刘世锦看来,互联网+的增长速度会更快,更重要的是它对各个行业的深度融合和改造,进而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率。目前来看,互联网+进展最快的就是网上购物、网上零售,未来对整个行业、整个经济和社会影响最大的还是实体经济,特别是生产领域的改造潜力很大。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过程中,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显得很重要。刘世锦认为,政府应该关注节能环保、环保、安全领域,对符合相关标准的企业进行扶持,并创造一个公平竞争、人尽其才的环境,至于用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则由企业自行去试。“环境创造好了,中国创新还是大有作为的。当然,这对政府的管理方式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相应的改革还需加快步伐。”

王一鸣: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王一鸣,则从经济的角度来讨论科技的事情。他在题为《以深化改革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的演讲中指出,只有创新上一个台阶,中国的中高速增长才可持续,才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

“我们以前靠劳动力等低要素成本参与国际竞争,而这种支撑产业发展的要素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王一鸣援引媒体报道称,目前珠三角人均用工成本为4000元左右,还不包括五险一金,而这个成本差不多是东南亚的3—4倍。

成本上升,企业未来靠什么盈利?制造业产能接近上限规模,产业如何迈向中高端水平。“根本上还取决于创新,使产业升级与创新相互融合。”他认为,要靠创新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

对许多人来说,创新就是科研机构搞科技攻关。

对此,王一鸣表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必须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创新不仅要以需求为导向,更要激发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活力。只有市场主体在分散试错中找准创新方向,才能推动创新走向成功。

创新资源怎么提高配置效率,人才如何留得住、用得好?“需要以深化改革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在王一鸣看来,首先,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包括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打破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改进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的准入管理,形成要素价格的“倒逼”机制等,促进优胜劣汰,激励人们创新。其次,要培育众创空间、创新工场等新型创新平台,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再者,要建立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把过去政府选拔型支持模式转变为普惠型支持模式。再有,要强化金融支持创新的功能,支持风投、创投、私募、众筹等发展。

科技成果转化使用、处置和收益权下放政策和股权激励延期纳税政策已经在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下一步能否在更大范围推广?科技成果如何转化、定价、挂牌交易?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系,创新培养和吸引人才的机制,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这些都和深化改革密不可分。

王一鸣认为,以深化改革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还需要从科技管理转向创新治理。以前是政府管理科技项目,而创新治理则需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都参与到创新过程中来。

有人说硅谷的空气中都弥漫着创新气息,其实这是指的创新生态。“深圳为什么培育出那么多创新型企业家,与创新生态是分不开的。”王一鸣直言,只有改革才能形成由创新企业、创新人才、创新金融、创新孵化、创新文化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

赵路:财政如何支持科技创新



“当前我国科技发展遇到的一些体制机制上的障碍,仅靠政策是解决不了的,还需与时俱进的推进科技改革。”

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长期从事财政科技管理以及相关政策文件的研究起草,在题为《财政科技政策与财政改革》的报告中,他阐述了财政如何支持科技创新和发展问题。

我国财政科技政策分为两大类,一个是投入政策,另一个是激励政策。赵路介绍,我国先后实施了科教兴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财政必须将科技作为重点支持的领域。

数据显示,我国财政科技的投入近年增幅明显,2010年,全国公共预算为3250亿,2014年增至5254亿。赵路说,财政通过直接投入支持科技,要遵循公共性的原则,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同时,还

要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处理好稳定支持与竞争支持的关系。

“关于财政科技激励政策,主要通过普惠性税收优惠、科技成果转化等激励来实现。”赵路称,经国务院批准,在中央层面科技成果转化处置权、使用权和收益分配权全部下放大学、院所等单位,取得的收入全部留归单位。今年已在自主创新示范区的20家大学和院所进行试点。对科技工作的激励政策,主要通过完善绩效工资制度、间接费用制度等,强化对科技人员的绩效激励。

在赵路看来,科技体制是政府科技管理的核心问题,科技体制改革主要应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明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科技管理事权划分,明确同级政府相关部门的科技管理职能,理顺政府与大学院所的关系。

“目前进行的科技计划管理改革,是具有历史性和里程碑意义的。”对正在落实的《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作为起草者之一的赵路深有感触。

在他看来,科技计划改革深远的意义有三个。首先,倒逼政府转变科技管理职能,政府部门不再具体管理、分配科研项目及经费;其次,通过整合科技计划,优化了我国的科技资源配置,提高了研发效率,使科技研发更加聚焦于国家的战略性目标;再次,推动了财政预算管理改革,盘活了财政科技存量资金,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

赵路说,此次改革涉及中央40个部门和100个科技专项,整合后形成功能定位清晰的五大类科技计划,有关的研发项目实行从上游到下游全链条的设计,目标要清晰,实施有周期,绩效要考核,监管要加强。如此一来,科技资源碎片化、科研项目重复申请的现象正在成为历史。

胡志坚:我国身处创新超越的大时代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曾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副司长,长期活跃在科技政策研究和制订的第一线。在题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有关问题》演讲中,他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什么是创新,什么又是新常态,未来的赶超之路该怎么走。

“创新不是研究开发,不是发现、发明,也不是成果转化、创业。”胡志坚援引熊彼特的观点说,“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上才提出创新政策,九十年代提出创新系统的理念,自那时以来创新一直是全世界科技政策讨论的热点。

比如,市场上总会有人想要采用赚取更高利润的生产方式,这就是创新冲动,一旦有人成功了,开辟了新的市场需求和方向,就会不断有新的创业者投身这个行业,新的生产体系就慢慢发芽、培育、壮大,并最终替代旧的生产体系。这就是创新驱动发展的过程。

胡志坚以我国加入WTO之后为例说,我国新兴产业通过一波创新浪潮异军突起,引领世界,例如光伏、手机制造、互联网、信息通讯、高铁、LED照明等。与此同时,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传统外包纷纷向中国转移,这对中国而言也是一次全新的生产方式的引进,带来了净利润和GDP的增长。

科技落后,关键技术掌握在别人手上,国际分工中处于中低端,创新体系包括市场制度不完善……在胡志坚看来,世界近代史表明,创新超越者大多是相对落后者。落后不可怕,关键是自身的创新发展状态好不好,能否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能否抓住创新超越的良好契机。

“当一个国家成为世界性工厂的时候,它就迎来了开始加速创新超越,并且引发世界产业变革的大时代。”胡志坚分析说,我们现在已经是世界性工厂,所以中国最具备在新时期引领变革的潜质。中国身处创新超越的大时代,我们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比较优势和条件,譬如,我们有大规模的廉价高素质劳动力群体,资本充足,技术水平形成了跟跑、并跑、领跑并存格局,企业家创新意识强烈,庞大的制造体系灵敏快捷……

在他看来,上述优势需要通过持续的体制机制改革才能得到发挥。中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崛起的规模比整个西方同时崛起的规模还要大。“可以引进的基本上引进完了,容易学的也都学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若还能获得新的生产体系和更新的技术,更多是靠原始创新。”胡志坚称,加强企业创新能力仍然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改革主题,但是,加强科学研究体系的能力建设,打造一流大学、一流科研机构,会日益显得重要。